

# 《东方杂志》对清末教育改革的推动和评价

彭慧艳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 230601)

**摘要:**《东方杂志》作为立宪派的舆论阵地,对清末教育改革给予很大关注,成为清末新式教育发展的积极支持者和推动者。它通过域外视野下的呐喊、官方奏折和已有教育成果的宣传,努力推动清末新式教育改革;在总体肯定新式教育改革必要性和积极性的同时,对新式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不足提出批评,发挥了舆论媒体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清末新政;教育;东方杂志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404(2013)59-0047-08

清末教育改革打破传统科举制度着重于培养官员的人才培养模式,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基础。提高民众素质、实现救亡图存、建设强盛国家,成为新式教育改革的既定目标。《东方杂志》开辟“教育”专栏,对清末新式教育的发展给予肯定,同时也对改革中出现的弊端给予批评,表现了舆论媒体的社会推动作用。

## 1 《东方杂志》对清末教育改革的推动

《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历经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全程,对新式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给予肯定和宣传,引起社会关注,努力推动清末新式教育改革。

### 1.1 域外视野下的呐喊

为打破科举教育范式下的思维定势,《东方杂志》独辟蹊径,对比欧美强国及通过维新变革成功跻身强国的日本,为发展新式教育呐喊。《东方杂志》在其创刊的前五期就有四期刊登了日本人长尾雨山撰写的署名“对客问”的连载文章。该文通过“客难主申”的方式,对新式教育发展在国家振兴上的重要意义以及其存在的有关问题进行重点分析。在第二篇中说道,“经邦八事:一曰教育、二曰产业、三曰交通、四曰财政、五曰兵制、六曰法律、七曰行政、八曰风俗。教育不起,莫以广人智、进文明。”将发展教育放在国家振兴的首位,并说明教育是提高人民素质、建设文明社会的关键。在第三篇中,长尾雨山认为“欲保国,则先保民;欲开国,则必先开民。

……尝观于世界列国之形势,智术日进,文化日开,翼翼乎,无一日或休。……今支那风气闭塞,文物不振。自非破旧蔽,开新智,何以能与列国联辘驰骋乎。破旧蔽,开新智,不可不由教育焉。”说明开化民智是保存和发展国家的前提,世界各国的科学文化正在快速发展,但是当时的中国科技落后、风气闭塞,所以必须发展教育才能破旧开新。而“智开则天地间之物可取以利人用厚人生,欧美列国之所以富强是已。盖文明者,由简单进繁复,由粗浅诣精深。弱造巩固,人人皆能具有,恒识之谓也。夫结绳之政,不可以理乱秦之绪。当今之世,独守其旧而不务广开新智,岂可谓知时务者哉?”指出欧美强国的富强在于教育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进而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认为在当前的时代之下必须顺应时务,除旧布新,发展新式教育,提高人民科学文化素质。

在其《对客问》第四篇中写到,“今言中国之时务者辄曰强兵,强兵而殊不知兵之本在民,民之本在教育,夫中国之兵,非士卒不众非器械不锐,驱不教之民以战所谓弃民也。”继续强调加强教育对于富国强兵的重要性。同时对照日本教育发展和中国当时新教育的若干表现,提出清末新式教育具有国民教育理念弱化、地方督抚积极性不强、办学经费不足、以新式教育为革命来源、教育思想僵化、社会资本远离教育、富贵子弟不肯学习、科举未废的负面影响、学生仅因新奇入学等等不足,并相应提出了“国民教育国家之利……有官学,有工学,有私学。省而府,府而县,各劝奖地方符号筹捐款项设为学堂而官任之节制可立办矣。……人民危言不受约束者是,

收稿日期:2013-10-22

作者简介:彭慧艳,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化等方面的研究。E-mail:lasdyvivi@126.com

岂新学之罪耶？……故老先进不喜新学者非新学之不是，特夏虫之疑冰耳。巨室富人不用财于教育者以未知教育之利也。……素封纨绔不肯刻苦修学者，古之所谓游民也，周官所刑也。……科举之制未废欲求仕宦无暇讲求新学。……入学者轻佻好奇无求新智之志者，教育不敷及之病也。”等建议，即认为要发展新式教育，应当做到实行国民教育、强化督抚责任、多方筹措经费、营造宽松环境、加强教育管理、大力兴办学堂、实行教育普及。

从源头上来说，清末新式教育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时人对于建设类似于西方文明，特别是基于西方文明发展起来的邻国——日本这样的国家的需要，而文明的关键在于教育。《东方杂志》有论者道，“今吾中国城乡住民，年齿税额均及格，可为公民者所在多有，而大半不识字，书不足以记名姓，数不足以计米盐，目不识图册版串为何物，耳不辨权利义务为何等名词，见官府示谕，茫然不知赤文绿字竟作何语。”说明文化素质的低下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故而要大力兴办新式教育，通过提高人民素质，以达到国家大发展的目的。

在为新式教育呐喊中还采取了与邻国日本直接对比的方式，《东方杂志》1904年第1卷第6号登载了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调查的“日本学校总数表”，并紧随其后发表《书日本学校总数表后》：“夫日本之幅员仅当中国两省之地，而学堂之多乃若此宜乎其蒸蒸日上也，查日本当三十九年前土佐人与法人构衅，旋为法人所制杀七人以和，於是国民发愤兴起，明治三四年间伊藤陆奥等集资赴西洋游学，初次往者五人耳，卒业归来各尽义务遂使文明大开，蔚然成为今日之日本，中国受外人欺侮屡矣，国民之愚极矣，覆亡之祸迫矣，我四万万同胞忍听其国亡家败身为奴隶则已不然者，请先取法日本，请先观日本全国学校总数表”，以日本为参照，指出日本土地狭隘，但是学堂却十分兴盛，进而指出日本强盛在于教育的发达、人民素质的优秀，而中国因国民文明开化程度不高，备受列强奴役。提出学习日本，首先要学习其教育。

通过域外视野下直接的中外对比，能够更好地激发国人在新式教育发展上的紧迫感。同时以日本为具体对比学习的对象，也有利于增强新式教育改革的紧迫感，有利于明确学习目标。

## 1.2 对教育改革官方奏折的宣传

《东方杂志》作为当时发行量较大的刊物，在教育专栏中连续刊登多位晚清重臣有关教育政策的奏章，以为清末教育新政之呼应。值得一提的是，与《教育杂志》等专业性教育杂志对清末教育改革政策层面的系统展示所不同的是，《东方杂志》似乎对于《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等清末教育的纲领性政策直接刊载相对较少，在清末8年（以《东方杂志》创刊和上海光复成立军政府为起讫点）中，仅仅在1904年第1卷第3号、第4号，连续全文刊载了《新定学务纲要》这一清末教育改革的基础性文件。《东方杂志》更多地关注晚清重臣有关教育改革和新式教育发展的奏折，这些奏折既有诸如《管学大臣等奏遵旨重定学堂章程妥筹办法摺》这样对清末教育新政顶层设计进行讨论的情况，也有《学部奏议复升任直隶总督袁奏请予詹天佑等四员出身摺》这样就教育具体问题上奏的奏折，还有诸如《学部奏议女子师范学堂及女子小学堂章程摺（章程附）》这样附带教育改革具体章程举措的奏章。据笔者统计，清末8年，《东方杂志》刊登的各类有关新式教育改革的文章共计538篇，其中奏折107篇，约占该时期《东方杂志》刊登教育类文章的20%，而来自当时最高的教育主管机构——学部的奏折共有55篇，占据了半数以上。通过对教育改革奏折——这种带有浓重官方性质文章的集中刊发，在官本位思想浓厚的清末，也有利于解除新式教育发展的阻力，赢得大多数人的接受和支持，为新式教育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从内容上来看，这些奏折大约可以分为推广新式教育、完善教育体系、解决现实问题等三个方面。

### 1.2.1 推广新式教育

首先从“废科举，兴学堂”开始。《东方杂志》在其创刊号上，刊登了时任军机大臣并管理学部的张之洞会同直隶总督袁世凯，上书清廷“试办递减科举注重学堂”的奏折，指出学堂虽然已经开始设立，但是受制于经费不足依然没有勃兴，究其原因在于“经费所以不能捐集者，由科举未停，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也，然则科举若不变通裁减，则人情不免观望，绅富孰肯筹捐，经费断不能筹，学堂断不能多。……入学堂者恃有科举一途为退步，既不肯专心向学且不肯恪守学规，况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止凭一日之短长，学堂

必尽累年之研究。……取材於科举不如取材於学堂”。说明教育资源为科举占据,致使兴办学堂缺少经费;并指出由于科举未废,读书人不肯用心新式教育,而实际上学堂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要远胜于科举。在如何递减科举兴办学堂、推动地方兴办学堂方面,给出建议“天恩明降谕旨布告天下,将科举旧章量为变通,从下届丙午科起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暂行试办。……乡会试中额请自下届丙午科起,每科分减中额三分之一,俟末一科中额减尽以后即停止乡试……学政岁科试取进学额,请於乡试两科年限内,两风考两科考,四次分减每一次减学额四分之一俟末一次学额减尽,即行停止学政岁科试以后生员即尽出於学堂。……人人争自濯磨,相率而入学堂,以求实在有用之学气象,一新人才自奋转弱为强实。”提出递减科举考试的进度表,实现人才出自学堂,并最终达到实用人才勃兴的目标。

《东方杂志》第1卷的5、6号,连续刊登了2位学务大臣关于办好新式学堂的奏折。学务大臣荣庆认为“查创办学堂必从师范及中小学堂入手,凡延请教习、考察人才、筹画经费,全在各府州县,切实奉行尤在督抚之提纲挈领,呼应始灵,另派总监督,人多权分,不如专任督抚,事权归一。”要求明确最高地方行政长官在兴办学堂过程中的责权。学务大臣孙家鼐提出“学堂发卒業文凭,兼列教习衔等语,查外国学校本有此办法,应请俟将来给发文凭时参酌办理”,要求明确学堂毕业生身份认定,并发给凭证,着力调动学生积极性。

### 1.2.2 完善新式教育体系

首当其冲的是各类“章程”——即教育形式具体规范的论述和宣传。比如军机大臣张之洞就曾连同学部大臣张百熙、荣庆上奏清廷,要求在原来学堂章程的基础上“拟成初等小学堂章程一册,高等小学堂章程一册,中学堂章程一册,高等学堂章程一册,大学堂章程附通儒院章程一册。原章有蒙学堂名目,但章程内所列实即外国初等小学之事,查外国蒙养院一名幼稚园,兹参酌其意,订为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一册,此就原订章程所有而增补其缺略者也”,对原有新式学堂办理章程进一步完善。此外,还有大量奏折在奏报事项的同时,也直接附上专门的“章程”,并将朝廷批复一并刊出,从而使这些规范具有国家法令的意义。如“专系注重工业,以教育贫民子弟,造就良善工匠”的艺徒学堂,其章程

获得朝廷“依议”的批复之后,在《东方杂志》上全文刊行。具体而言,该章程从新设学堂的命名、宗旨、办法、教授课目、职员、管理规则等六个方面进行规范化描述和规定,特别是在教学方式、学习科目两个层次的细化,实际是固化了此类学堂办学的核心框架,具有很强的指导和示范意义。在杂志中该类奏章数量颇多,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各地新式学堂的办理,提供了积极的范式意义,是对同类别新式学堂办理方式的推介。

### 1.2.3 新式分科教育的介绍

《东方杂志》还通过奏折的形式凸显了各类新式分科教育的办理,对于当时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的现代化、综合化起到很好的宣传意义。相较于科举时代的教育模式,在相当数量的奏折中,提倡实业、军事、法律、巡警、女子师范、医学等各类新式分科教育。如1905年第二卷第三号《东方杂志》刊登《商部奏改南洋公学为高等实业学堂摺》,即是其办理实业教育的一个例证;此外《练兵处兵部会奏遵议出使美日秘古墨大臣梁奏请设陆军大学省学并选王公子弟入学习肄习摺》、《陆军奏拟陆军贵胄学堂各生毕业出身暂行章程摺》倡导并实践现代军事教育;《学务大臣奏遵旨议复专设法律学堂事宜并各省课吏馆添设仕学速成科摺》、《学部奏筹设京师法政学堂的拟章程摺》,提出应发展法政教育,在培养法律人才方面做出规划;《民政部奏办高等巡警学堂摺》、《民政部奏拟各生巡警学堂通行章程摺》倡导发展巡警教育,就做好警务人员的培养做出规划;《学部奏详议女子师范学堂及女子小学堂章程摺》、《学部奏遵议设立女子师范学堂摺》关于女子师范学堂建立的意义、方法提出奏对;《学部奏议复中西医学分科肄习摺》、《学部奏陈医学馆学生毕业奖励办法片》倡导建立学校医学专科,并对医学人才的身份界定和使用提出办法。

### 1.2.4 对新式教育实践中出现问题的讨论

作为新事物的清末新式教育改革打破了绵延千年的科举教育模式,在推行之初势必引起传统惯势的不适应,甚至反对,再加之殖民势力渗透、社会政治混乱、民众生活困窘,新式教育的推行注定会出现诸多问题。在《东方杂志》所刊清末教育奏章中,还有一类立足于解决新式教育发展中出现的有关问题。在《会议政务处学部等会奏议复翰林院侍读周爰谏奏请整顿学务摺》一文中,在留学生管理方面

提出“其中浮薄少年，学无根柢，不免惊于新奇、惑于邪说，致有悖逆之词，惟应飭令驻使监督，随时访察劝道，消除恶习。”认为应加强对留学生的管理，防止其出现反对清政府的思想。尽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清廷钳制进步思想的手段，但是从清政府作为留学教育推行者的角度来看，这也是解决留学活动中出现问题的具体政策；在同一篇中提出有关学堂的师资问题“至于内地各学堂从前开办伊始，教习缺乏，不得已设立速成师范与师范传习所，以应急需。其于洋文即聘用留学生为教员，中学根柢未深，知所不免，要皆一时权宜之计。”认为学堂师资不足，而且聘请的留学生中国文化根基不深，也只能作为权宜之计。对于这种情况，文中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今则师范学堂设立渐多，毕业生必通中学，始充教员。学部《奏定章程》于速成毕业则停其考试，优级师范则立于省会，任用教员则视乎文凭，业已逐渐改良矣。”说明以前依靠速成学堂培养的教师，从知识结构上确有不足，以后要求具有文凭的优级师范毕业生才能充当教师。在学堂公休方面，该奏折提出“仍用七日一休息办法，以便师生而收功课之实益。其日仍沿用日曜轮值之期，名曰：星期，并不名为礼拜。”规定星期轮休的学堂放假方法。

晚清末季内外交困，国困民穷，新式教育苦乏经费，在这些上奏朝廷的奏折中不断提出有关解决办法，“清水衙门”钦天监认为应“拟仿各衙门提解各省饭银成案，将臣监颁行时宪书样并发给时宪，书各省分承领。时宪书各州县每月筹给饭银一两，每季三个月筹银三两，每年解饭银十二两，其数甚微在各州县无论出自公款外销均无甚损，臣监得此一款不无小补，即以六成陆续刊刻御制数理精蕴等书十一种二百四十一卷，板片之专款八厘作为整顿算学之用，下余三成二厘稍加津贴司员，俾得教授有书遵循，当差得以踊跃，实於数学公务两有裨益。”希望自全国各地征集经费，促进数学教育的发展。

在规范教育行为方面，陆军部提出“近来游学生，往往有未经毕业，辄藉端回国就差者。半途辍业，殊为可惜。且此项学生于军事尚未窥底蕴，遽使参与戎机，亦非慎重军政之道。尤恐此风一开，各学生狃于近功而忘远略，殊负朝廷整军经武，作育人材之至意。拟请嗣后官费游学陆军学生未经毕业及臣部考覈者，如有擅自回国就差，一经查明，即行咨撤差委，并将从前所发学费、川资等款悉数追缴。俾学

生等知所趋向，庶几学有成就、帑虚糜，实于用人行政两有裨益。”针对学业未满就有留学生提前回国的现象，要求严加监督，一旦发现就要免除差事，并追回给付的各项费用。

《东方杂志》所刊载的有关教育方面的奏章，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当时行政机构和朝臣对于教育发展的态度和建议。特别是考虑到清末教育新政实际上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进，作为身处改革浪潮之中的官员，既是传统教育的受益者，又是新式教育的发起者，其教育奏折颇值得玩味。其中固然充斥不少宣扬诸如“不准购阅悖逆书”的钳制进步思想之类的论调，但是总体而言对于倡导和推动新式教育发展，加强自然科学和现代管理科学学习具有重要意义。

### 1.3 新式教育改革成果展示

随着新式教育的不断推行，其成果也逐渐显现出来。《东方杂志》以“各省教育汇志”的简报形式，集中展现各地新式教育发展情况。如关于设立学堂，“山东省垣官场中人现拟设学堂曰，公立小学堂已将办事简章印行学额六十名限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者为及格，每月出费二元四年毕业已租定高都司巷北首民房开办学董十人共认捐二千金为开办经费。”表明山东有官员办学，并说明具体办法；关于教育经费，“安徽，徽州府黄太尊正源因皖南茶厘局长年有五万五千金解京贡内务府之款，特稟请将尾数五千金拨充中学堂长经费，藩台联方伯以事关兴学准之并闻中学堂得此款已将开办。”说明安徽采取划拨茶叶税的办法，征集办学经费；关于女子教育，“奉省学务处以开办女学师资缺乏，特于大南关小河沿地方设一女师范学堂，招年在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之女子，粗通文理愿充师范者，四十名入堂肆习，以两年毕业。”说明奉省开办女子师范学堂；关于实业教育，“潮州黄君仲燮等近在郡城设立建议染织所，名曰强华，以养成简易染织技师及各府州县工厂教员为宗旨，学生定额八十名，以四个月为别用，于二月开学。”提出举办实业教育的例子。在《东方杂志》中诸如上述各类兴办新式教育的途径多有展示，不一而足。

通过对新式教育成果的宣传，一方面展示新式教育从理论到实践的具体成效，是对已经固化成果的宣传；另一方面也是在发展不均衡状况下，先进地区对落后地区的示范；同时还起到了引导民心、营造

氛围的作用。

## 2 对于清末教育的评价

关于新式教育的发展,从制度到实践都受到了《东方杂志》的关注,在肯定新式教育发展的意义和作用的基础上,也对新式教育改革中出现的部分问题,提出了批评。

### 2.1 对新式教育改革本身的肯定和拥护

清末教育改革,被定位为国家强盛、人民富足的必由之路,正如《东方杂志》所载“观国者皆曰:立国以兴学为先务,中国今日一线之生机在于此矣。中国人也望中国之兴,如大旱之望水。”认为中国兴旺发达的一线生机在于兴学。还有人指出“教育者造就国民之基础,存立国家之命脉,不可须臾离者也。人无教育是曰非人,国无教育是曰非国。”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随着清末东学西渐和“开眼看世界”的影响不断扩大,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教育成为教育变革的重要内容,《东方杂志》对于这一变革给予肯定。在《论废科举后补救之法》一文中写到,“废科举设学堂之策,清议持之者二十年矣,而今果见诸施行,不得不谓朝廷之圣明,国家之厚幸也”,热切地赞赏废科举开学堂;另有文章指出“(废科举,兴学堂)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将其上升到社会变迁的重要里程碑意义。而作为立宪派重要舆论阵地的《东方杂志》在“本社撰稿”的署名文章中直抒教育和立宪的关系,“国民知识之幼稚、能力之薄弱,则宜有术以培养而助长之,数年以后度不难及立宪国民之程度,其术维何?则教育是已!教育既遍,国民胥智,政治上之知识皆磅礴於人人之脑中,而后自治之能力随在可以发挥,以之充议员之选闻国家之事,其恢恢乎游刃有余矣,然当教育未溥之时决不能遽行立宪,若逆其道而行之,适足以增异日之障。”认为新式教育发展是立宪政体建设的先决条件。实际上,《东方杂志》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舆论风向,对于新式教育改革寄予厚望,认为新式教育是救国救民的一剂良药。然而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也出现了不少弊端,《东方杂志》对此提出批评。

### 2.2 对新式教育部分制度性弊端的批评

新式教育政策的“顶层设计”主要来自于张之洞、张百熙等为代表的清廷高级官员,他们既是新式教育的开拓者,同时也是科举教育的践行者和受益

者,而且这些政策制定者从亲身经历上来说,对来自西方的新式教育多出于间接。张之洞本人又是“中体西用”的观点拥护者。故而张之洞按照湖北模式牵头制订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作为清末教育改革的总纲也表现出一定的不足。《东方杂志》对此进行批评。

#### 2.2.1 认为儿童强制读经不符合教育规律

日本人长尾雨山在《东方杂志》上发文,“余曾观《奏定学堂章程》矣,其不合教育公理者,不一而足。如课初等小学以读经,其最甚者也,夫经固不可不读,然幼童六七岁始就学,目不识丁,且所教学科门目,即令识浅近之意,犹病其难,而乃教之以皓首难解之经,岂不悖耶?”认为《奏定学堂章程》在儿童教育的科目设定上,不符合教育规律,强制读经并不适合没有文化基础的儿童学习。对于将经书作为小学生的必修课的情况,《东方杂志》编辑蒋维乔提出“六经者,参考书也,非教科书也。中学校以上之学生所有事也,非小学校儿童之有事也。古之六经者,固非尝为今日小学教科书也,今即欲为教科计,则采其中格言,合乎今日之情势者,编入修身书可也。欲独立为读经一科,不可也。”认为六经不适宜作为小学生的必修课,从保存传统的角度来说,最多可以采用其中的经典语言,结合清末社会发展的实际,对内容进行编辑后放入道德教育的读本之中,对儿童进行修身教育,如果将儒家经典作为独立科目强行要求幼童阅读背诵,则是不可行的。而针对有人提出的,下令儿童读经可能会导致国粹传承中断的言论,加以反驳“如欲保存国粹,则于大学堂中设一经学专科已足。”将儒家经典意义上的国粹传承和幼童读经加以区分,指出可以通过大学专科的设立来保存国粹。

#### 2.2.2 指出奖励出身是对新式教育发展的反动

除对于儿童蒙学强制读经做出批评之外,《东方杂志》还刊文就新式学堂奖励出身做出评论。《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各类学堂毕业之后可以对照给予功名,即利用奖励出身的方式,吸引学子进入学堂,同时也为为数众多的旧式读书人在科举制渐趋废除之后提供导向,还为各级行政机构人员补充提供途径。从出发点来看,对于减少新式教育办学阻力、维持社会稳定,具有积极作用。然而,《东方杂志》认为新式教育的出发点是培养各类专门人才,特别是近代自然科学人才,给予出身进入传统官

僚体系,并不能发挥其专业作用,实际上背离了其培养新式人才的出发点,进入“学而优则仕”的惯势之中。从科举与新式教育区别来看“科举为造一般仕宦人才而设,学堂则为陶铸全国之国民,使皆得实地之生活而设也。若引全国而趋于仕宦,则何如仍科举之为愈矣。若以学堂为进身之阶,又奚怪乎顽固党人谓学堂为科举之变相也。”如果按照奖励出身的办法,则会使新式教育落入科举制的窠臼之中。此外,署名蛤笑的“本社撰稿”指出“学校之与贡举截然两物,离之则双美,而合之则两伤者也。兴学之本意,原欲使通国之人咸有国民之资格,是故以学牖知,以达材小之。使足以善生而完其为人之,量大之足以造道而进于利群之功,教育所求盖乎此矣。若夫贡举也者,则官人考绩之方,善事利器之用此属乎,行政方面者也,两事相成不容偏废。谓贡举之人必于学校中求之,则可谓学校即可以当贡举,则不可。”指出学堂教育和以培养官吏为目的的贡举制度的区别,并说明二者不能混淆。

此外,《东方杂志》还刊登出身传统教育(早年在两湖书院学习)后留学日本并考察欧美日本西学新政的田吴焯对比中外教育的论述,“学成本系有用之才,而致用自有试验之方。断未有今日出学堂,明日登仕途,如是之捷径也。且国家名位,官职以待人才,非悬名位官职以教人才。从前科举之弊,误在诱之以利禄,今以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则所以示士子之趋向万不可再涉此意。”说明国外的学堂旨在培养专门人才,国内学子一定要吸取以前科举的教训,不能心存出学堂、登仕途的想法;而且从官员遴选的角度来说,奖励出身实际上是对新式教育方向的误导。

### 2.2.3 批判歧视女性教育的政策规定

“癸卯学制”的主要设计者张之洞认为“中西礼俗不同,不便设立女学及女师范学堂”。体现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就是“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学。”规定“女子只可于家庭教之,或受母教,或受保姆之教。”即将女性教育排除在社会教育之外,女子受教育最多只可以局限在家庭之中。《东方杂志》对此给予抨击,有人从女学的作用出发,指出“女学之兴有二要义,一则教之保育,以为家庭教育之始基;一则教以职业,以为佐理生计之内助。此其影响甚大,故各国莫不注意于此。”说明兴办女学需要从“保育”和“职业”两个方面加以推行,

既有利于通过家庭教育提高民族素质,又有利于帮助女性更好投身社会建设中,并特别说明兴办新式女性教育也为世界各国所重视。还有论者认为“女学者蒙小学之本也,女学不进一国生计必不充,人种必不强社会必不良,而於教育尤大有障碍。无女学则无儿童教育,无儿童教育则教育之基础不立,教育之功效不广,此其理今人多能言之,即执政者亦未有不深明及此,无待吾再道也。夫其事之当行而显见者如此,朝廷曾不闻有一敦促兴办之特谕以为之倡,是岂所以为强国福民之计也哉。新政之缺点此其一。”从清末新政不足的角度,来倡导女学。中国女权运动首倡者、女子教育先驱者吕碧城在《东方杂志》发文,以清末正处民族危亡之际,积极倡导女学“男之于女,犹如辅车唇齿相依。君之愚弱其民,即以自弱其国也,男子愚弱其女,即自弱其家也。惟愿此后合君民男女皆发深省,协力以图自强。自强之道,须以开女智,兴女权为根本。”指出兴办女学意义重大,事关国家盛衰,刻不容缓。

### 2.3 对新式教育具体实践功利化的批判

新式教育举办之初,由于思想意识、法律法规等落后,致使新式教育功利化较为严重,这也引起《东方杂志》的关注和强烈批评。甚至有人认为在功利化思想之下普及教育将危害国家发展,究其原因,在于“教育既普及在创设学校者,初无培植人才之意,不过借创设学校之名,以博当道者之奖励,或借以广通声气,为异日招权纳贿之基。在肄业学校者,亦非以求学为宗旨也,不过缘学级以迁升,以冀毕业证书之幸获,则学校者,人人视为利禄之途者也。”说明在王朝末年制度性腐败的情况之下,创立学校和进校学习者,都不是有志于发展教育,而仅仅是为了一己之私利,而做的积累。有论者甚至直接批评学堂学生道“诸生就学者亦不过藉以千禄”说明学生入学也仅仅为了将来有一个好出路,把新式教育当做敲门砖,而学生的这一想法实际上是对新式教育出发点的背离。

### 2.4 对学堂腐败的批评

《教育普及议》所说“教育普及之策哉,然卒不能普及,则以民智不开,而塾师为之障也。夫学校之设,已及数年,然舍一二商埠外,则教育之权仍操于塾师之手。而世之为塾师者,复墨守旧章,因循不革,虽有良法美意,莫知适从。”新式学堂仍然掌握在旧有塾师的手里,而这些人思想因循守旧,对于新

式教育不思探究,仍然按照传统的模式来管理学校,这种情况下即便再好的办法也无法取得好的推行效果。有论者分析江宁地区学堂哄闹解散等问题的原因“实大半因执事、员司、董事等,凡事不能和众持平以致一发再发,无可遏抑,甚或凭仗势力把持学务,凌侮生徒,积不相能因而群起为难,甚或侵蚀款项,致启学生轻视之心迹。种种行为闻之令人齿冷。”而且从范围上来看“以府县两学堂,尤占大多数。”其原因在于“盖以两堂之总办,其任用私人及种种败坏学务之事,为更甚也。”最后“然学堂之腐败何地不然,岂特江宁一邑独收此恶果耶?”进一步说明学堂腐败具有相当范围的普遍性。

在《东方杂志》中还刊登评判学堂腐败的专文:

今忽有此办学堂之名,则平日之蕴毒至此而大泄矣,案办学堂之名其可以利用者,凡数端:学堂为奉旨举办之事,故遵王一派人不得而非之;学堂又为外人许可之事,故媚外一派人不得而非之;学堂又为开通风气之事,故新党一派人不得而非之。於是对官吏对外人对报馆均有可藉之辞,取怜之道而使之不出於反对,而乐於赞成既有此至大之题而据多数人许可之势,其力遂足以报平日之怨,充公勒派惟所欲为。不久学堂成矣,一校之成房屋器具饭食仆隶仪器书籍,其种种开销既极繁夥,且强半之事物为内地人所不习知,遂得任意报销,恣其中饱。以经理学堂而起家者已屡见其人,大率一校之中总理教习司事等员,或以为娱老之方或以为威福之地,或以为殖产之计各行其事,而教育一端则全置诸度外,故中国之学堂养老院也、栖流所也,庞杂废弛不可言状。开之八七年徒见经理者营家宅置田产,执事者妻妾肥泽衣食温饱,而教成之学生则杳然不知其何在,然则营私负国坐耗资粮与不肖之僧徒逐利之狙佞,曾无少异。

指出办理学堂为当时社会所推崇,各派别对于办学一事,都持积极态度。待学堂办成之后,又成为办学敛财、养老或作威作福的工具,而学堂在培养适应近代化发展能力的学生方面毫无建树。

### 3 结语

《东方杂志》以其君主立宪派的温和改良观点,对于教育新民、富国强兵寄予厚望,给予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发展近代教育的改革充分肯定和宣传,然而处于社会大变革时代的教育革新注定要经历尝

试、摸索的过程,再加上王朝末年风气迟暮,进取不足,教育改革也面临不少问题,对此,《东方杂志》也积极给予批评,冀望为社会发展提供一参照。

当然,《东方杂志》编撰群受制于时空和视野的不足,对于部分问题的看待也不尽确然,如否定政府办学的积极意义,认为“以官吏司全省学务,无非位置、宦途、人材。呜呼!以此言教育,是犹饮鸩以求活。”忽视了中国地域广大、发展不均衡、具有中央集权传统的实际,并不具备很好的借鉴意义。认为学生入学完全出于功利和学堂腐败的全局性认定,也有失偏颇。而且事事皆以日本为参照,虽然在当时具有激发人心的作用,也失去了结合中国实际的应有之意。

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在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下,《东方杂志》通过自身的系列报道,对于发展新式教育起到了积极的社会引导作用,也反映了其编辑和作者群的理性改良主义思想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

### 参考文献

- [1] 东方杂志(1904-1911)[J].
- [2] 吴春梅. 张之洞与清末立宪[J]. 江苏社会科学, 1999(6).
- [3] 吴春梅. 一次失控的近代化改革——关于清末新政的理性思考[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8.
- [4] 闵定庆. 公共舆论与现代性的展开——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1904-1932)[J]. 中国出版, 2007(3).
- [5] 丁文. 营造一时之“国论”——《东方杂志》的舆论理想[J]. 云梦学刊, 2009(1).
- [6] 马自毅. 辛亥前十年的学堂、学生与学潮史林[J]. 2002(1).
- [7] 方汉奇. 《东方杂志》的特色及其历史地位[J]. 东方, 2000(11).
- [8] 王笛. 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J]. 近代史研究, 1987(3).
- [9] 全泽矿. 论《东方杂志》的教育批判意识[J]. 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1(2).
- [10] 关晓红. 张之洞与晚清学部[J]. 历史研究, 2000(3).
- [11] 张小丽. 清末国人“教育”观念的演变[J].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 2011(2).
- [12] 张小莉, 胡红晓. 清末十年兴学经费的困顿与筹措探析[J]. 学术研究, 2008(7).

- [13] 肖建文,杨婉琪.清末新政与中国教育制度近代化[J].宜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5,2(27).
- [14] 邱巍.清末教育变革中的奖励出身制度[J].教育评论,1999(2).
- [15] 赵曼.《东方杂志》研究综述[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10(24).
- [16] 陶惠娟.《东方杂志》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的贡献[J].黑龙江史志,2010(21).
- [17] 丁文.“选报”时期的东方杂志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18]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
- [19]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 [20] 王天根.清末民初报刊与革命舆论的媒介建构[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
- [21] 任时先,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
- [22] 洪九来.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1904-1932[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23] 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
- [24] 三联书店编辑部编.《东方杂志》总目[Z].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 [25] 朱有瓛.近代学制史料[Z].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 [26] 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 The Evaluation on Eastern Miscellany Promoting the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Peng Huiyan

(History Department of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Province 230601, China)

**Abstract:** As the voice of those constitutionalists, Eastern Miscellany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magazine became the supporter and impeller of the new education development during that period. It promoted the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by strongly advocating the new education reform,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related memorials to the throne and publicizing the reform achievements. Although the magazine pointed out the necessity and positive aspects of the new education reform in total, it also criticized the insufficiency of the new education reform at the same time, which positively promoted the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education; Eastern Miscellany